

第六章 社会动荡

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一 北洋派系的分化与皖系统治的确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权，利用北洋军的力量，对中国实行独裁统治。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失去重心，随之分裂成皖、直、奉三大派系。

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又在德国学过炮科。在袁主政时，段一直把持陆军总长职务，1916年4月，还出任国务总理。袁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及安徽、浙江、福建等地。

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袁主政时，曾任禁卫军统领。在二次革命时，冯率兵进攻南京，此后，即以南京为基地，从事扩张。袁死后，以冯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以及直隶等省。

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早年投

身绿林，1903 年投诚清廷，在奉天督军张锡銓手下任巡防营管带、统领。辛亥革命后升任师长，1916 年 4 月，因支持袁世凯称帝，换取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头衔，控制了奉天地盘。此后，逐步扩张亦控制了东三省。

除这三派大军阀外，地方军阀势力较大的有：山西阎锡山的晋系，云、贵唐继尧的滇系，两广陆荣廷的桂系。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号召，扩张地盘和势力，小军阀以“保境安民”或“联省自治”为借口，拥兵割据，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割据争雄，尤其是皖、直、奉三派大军阀都企图控制北洋军阀政权。而皖系军阀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凭借他的国务总理的地位，利用陆军总长职务在北洋军阀中所固结的实力，首先取得了对北洋军阀政权的控制权。

根据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缺位，副总统继任。”但段祺瑞为了专权，却要依据 1914 年“袁记约法”中“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决定总统的继任问题。这样，黎元洪虽于 6 月 7 日就任总统，却是“代行”大总统职。

这一规定，遭到了各方的坚决反对。首先是以军务院为代表的西南势力，西南各省于 1916 年 5 月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与北方政权对立。此时，军务院主张依《临时约法》由黎“继任”总统，反对“代行”孙中山也发表宣言，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而，南北展开新旧约法之争。

当南北争论不休的时候，6 月 25 日，海军以总司令李鼎新等为首，宣布拥护“旧约法”，并声明在“旧约法”和国会恢复、正式内阁成立之前，海军拒绝接受北洋军阀政府的任何命令，这对北洋军阀特别是割据东南的直系，是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冯国璋电促北京，要求和平解决争端。6 月 29 日，段祺瑞被迫接

受南方要求，声明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

8月1日，国会如期举行，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9月初，国会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0月底，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这样，南北和解，表面统一，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下来，正式政府宣告组成。

段祺瑞虽然没能达到使黎元洪“代行”总统的目的，但也有很大的收获。他利用国民党人“责任内阁”的一贯主张，以责任内阁制取代总统制，把黎元洪置于傀儡地位，而自己则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控制了北京的军政大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的实际统治者。从此，确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统治。

二 皖系的亲日外交和独裁统治

北洋军阀政权在表面上看是黎段体制，而实际上总统府不过是摆设，实权完全控制在国务院，段祺瑞是中国社会的最高主宰者。皖系军阀的统治，实际上是袁世凯统治的继续。

段祺瑞积极推行亲日政策。1916年12月，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来华，段祺瑞派曹汝霖、陆宗舆与之密谈，就日本对中国借款等问题达成默契。1917年8月，段祺瑞政府建立由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以陆宗舆为总裁，专门负责对日借款。在此后的两年间，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政府大量借款，这就是“西原借款”。仅西原借款即达14500万日元。通过西原借款，日本取得了在中国的一系列权益。段祺瑞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将东北的吉长、吉会等铁路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金矿、森林全部抵押给日本。同时，日本以各种借款等名目，控制了中国的电讯事业，派遣大批顾问、军官进入段祺瑞政府和军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1918年5月16日和19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先后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

队大批开进中国东北，将东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段祺瑞推行亲日的外交政策，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因而支持黎元洪，意在通过黎控制北洋军阀政权，扩大自己的在华势力。由于美日在华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以黎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为代表的国务院的严重矛盾冲突，史称“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 1917 年春天，在对德参战问题上开始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于 1914 年 8 月 6 日宣告中立。1917 年 2 月 3 日，美国对德宣布绝交，并希望中国参加对德作战。黎元洪幻想得到美国支持，欣然接受了这种意见。日本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军事、经济，也希望中国对德参战，并利用英、俄、法等国希望中国参战的机会，于 1917 年 2—3 月间，先后同俄国以及法、意等国签订密约，以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作为日本赞同中国对德参战的条件。由于日本利用中国参战问题取得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条件，因而美国又表示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也遵照美国的旨意，起而反对对德参战。段祺瑞则遵照日本的旨意，极力主张参战。“府院之争”开始激化。黎元洪的主张，得到了在国会中占多数的国民党议员和一部分阁员的支持。段祺瑞为压服黎元洪及国会，利用督军团的力量，实行武力威胁。4 月 25 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 20 余人集会北京，组成督军团，宣布赞同总理外交政策。5 月 1 日，国务会议开会，各督军和代表闯入会场，强迫内阁通过宣战案。5 月 10 日，段派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2 000 余人，包围国会，毒打议员，威胁国会通过参战案。因国会没有通过此案，段便指使督军团联名上书，要求修改“约法”，赋予内阁以更大权力，否则，各督军将不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甚至要求解散国会。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于 5 月 23 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及陆军总长职。段祺瑞则发表通电，否认免职令有效，并煽动各省独立。5 月 29 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接着，奉

天、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直隶等省先后响应。与此同时，段祺瑞在天津成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与黎元洪对抗。

各省独立，京津对峙，北洋军阀政权处于危机之中。6月2日，皖督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率兵进京，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于7月1日拥废帝溥仪复辟。这时，段祺瑞又以“反复辟”为名，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张勋。12日，溥仪宣告退位。14日，段入京，重任国务总理。8月1日，冯国璋入京代行大总统职。

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同时派北洋军讨伐南方，企图实现武力统一。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为驱逐冯国璋，段祺瑞从日本借款中拨出80万元，由徐树铮出面收买一批官僚、政客组成“安福系”（因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乐部得名）。1918年8月，安福系操纵改选国会，组成新国会（对旧国会而言）。因安福系议员在新国会中占绝对多数，又被称为“安福国会”。9月，安福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和安福系进一步控制了北洋军阀政权。

三 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把《临时约法》和国会看作是共和的象征，民主自由的保证，辛亥革命胜利的标志。因此他真诚地予以维护。

早在护国讨袁之役中，孙中山就指出：“袁世凯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护民国，自当自维护约法始。”^① 1917年7月初，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解散国会，踢开约法，抛弃共和，孙中山立即通电全国，宣布护法，讨伐叛逆。7月12日，段祺瑞赶走张勋，孙中山曾致电段祺瑞，要求恢复国会和《临时约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页。

法》，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张勋复辟和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是反袁斗争以后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矛盾的又一次激化。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宣言为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奋斗，揭露段祺瑞“以叛讨叛，以贼讨贼”，“假借反对复辟拥护共和之名以图自固”，致使“大法荡然”号召议员南下“行民国统治之权”^①。

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海军将领程璧光等率第一舰队首先南下，许多国会议员也响应孙中山号召，陆续到粤。8月中旬，议员到粤者130余人。19日，孙中山发出通电，再一次揭露段祺瑞毁坏国会，推翻约法，乘机窃政的罪行，表示护法讨贼，以谋统一的决心。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31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大纲》明确规定军政府宗旨为“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②，在《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由军政府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之行政权。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大元帅任命，产生军政府各部部长，正式组成护法军政府。军政府成立后，于9月26日宣布对德宣战，接着出兵北伐，发动了护法战争。

护法军政府，是在孙中山护法的旗帜下组成的政府。但它一开始思想上就不统一，力量也不集中。西南军阀参加“护法”运动，目的在于借“护法”旗帜，对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保存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对军政府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两面政策，利用军政府作为对抗北洋势力的招牌；同时又限制军政府力量的扩大，防止它成为南方统一的最高权力机关。陆荣廷、唐继

长沙：《大公报》，1917年7月31日。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4页。

尧被选为元帅后，均不肯就职。孙中山曾先后派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到南宁会见陆荣廷，请就元帅职；又派章太炎为特使，携带元帅印到昆明对唐继尧劝驾，然陆、唐二人始终不就不辞。这种情况说明，陆、唐二人既想占有向北方讨价的资本，又想保留对北方妥协的条件。这在政治上对护法运动影响极大。

西南军阀在军事上破坏孙中山建立革命武装。孙中山到广东以后，曾拟组织政府军。广东省长朱庆澜因欢迎孙中山赴粤，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辖的 20 营省长亲军交出。孙中山也准备将此 20 营军队编为护法军，委陈炯明为司令，隶属于军政府。粤督陈炯明承陆荣廷旨意，以统一军权为借口，反对军政府拥有独立的军队，坚持接收这部分军队，并排挤朱庆澜离开广东。革命党人谴责陈炯明接收省长亲军的行动，并派胡汉民等与陆荣廷进行交涉。陆荣廷为利用护法这块招牌，表示让步，同意调离陈炯明，自任粤督，由莫荣新代理，交还 20 营省长亲军，由陈炯明统帅。同时，要求陈炯明率部入闽，名为牵制北洋军阀势力，实则不准护法军留在广东。

陈炯明兵进福建，军政府仍等于没有军队。孙中山招募部分卫队，但莫荣新以土匪罪名，将卫队连数十人捕获，全部枪毙。孙中山在桂系不合作的情况下，为加强军政府的势力，又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莫荣新指使各县，凡招兵人员一律指为土匪，就地枪毙。增城一县就有 69 名人员被杀^①。桂系军阀牵制军政府的行动，引起孙中山的愤慨。1918 年初，孙中山密令海军炮击督军署，企图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但没能成功。这件事说明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表面化了。2 月 26 日，海军将领程璧光在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 720 页。

珠海遭暗杀，使唯一拥护孙中山的海军失去主帅。5月4日，桂系与滇系相勾结，又强行夺去坚定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交通部次长崔文藻的权力，并拘捕张开儒，枪杀崔文藻，使军政府的力量受到严重打击

西南军阀在政治上采取分化非常国会的政策。广州非常国会成分比较复杂，奉岑春煊为领袖的政学系在政治上依靠桂系，与直系军阀明来暗去，主张联冯制段，是非常国会中的右翼，在国会中占有相当数量；据有领导席位的是中间派，其中不少人是失意政客，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升官发财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到南方来是猎取禄位的；只有一部分旧国民党人支持孙中山。为了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通过政学系拉拢国会中的中间派。在取得国会中的多数以后，政学系抛出了《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案》，提出以总裁合议制代替大元帅制。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以97票对27票的多数通过“修正案”。5月20日，根据“修正案”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懌、岑春煊7人为军政府总裁，随后，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排斥了孙中山的领导，护法军政府遂成为南方军阀政权，开始与北洋军阀妥协，酝酿南北议和。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继续，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仅仅是为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所依靠的又是没有护法诚意的西南军阀，和毫无群众基础并为政学系所控制的国会，使护法运动限于少数人范围之内因此，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四 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新变化

19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但由于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它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造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时机。各国输华货物总值，1913年约5.7亿余海关两，1915年竟跌至4.5亿余两，减少五分之一，直到战争结束的1918年，始终未能达到战前水平。由于外货进口的减少，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国内市场，获得快速发展时机，使每年平均公司注册相当于民国初期的3倍^①

欧战在客观上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国际市场。战争期间，各参战国出口减少，其垄断的国际市场出现了空隙，特别是民用产品出现了极缺的现状，为中国民族工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当时中国的面粉一度远销英、法、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同时，也使企业数量和投资大量增加。中国近代工厂，1913年总计有698家，到大战后的1920年增为1759家。全国工业投资总额，1913年为4987.5万元，1917年增为12824.4万元。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资本迅速向工业资本转化。许多商业资本家竞相投资工业，开办工厂。这种情况，反映了工业产品利润的稳定性与向上的趋势，也为工业发展开辟了资本来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期间虽有发展，但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动力等方面，大都依赖进口。工业基础和资金的薄弱，也严重地限制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的控制、军阀的黑暗统治，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束缚。

杨诤：《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见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4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首先，资产阶级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仅从注册企业上看，资产阶级队伍在 1918 年就比战前增加 3 倍。民族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也随之加强。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表现得日益明显和突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表现得相当活跃。资产阶级为反对专制主义，实现民主共和所进行的多方探索和不懈地斗争，是同其阶级力量的增强密切相关的。

第二，阶级关系变化的突出表现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只有 60 多万，加上海员、铁路工人，也不超过 100 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加，到 1919 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已发展到 200 万人左右。中国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地位极端低下。由于中国工人所受压迫严重，生活极端痛苦，政治上没有自由，因此，中国工人，除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中国工人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些较大城市，每地都集中十几万至几十万的工人；在行业上，又多数集中在铁路、矿山、航海、纺织等大企业。因此，就全国而言，工人总数并不多，就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而言，工人数量在全人口中又占有相当的优势，能够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中国工人多半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易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工人阶级的上述特点，是它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成为领导阶级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出现了一支新的知识分子队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

1907年，全国有大、中、小学校37788所，学生1024900多人。其中，大学3所，学生749人，省立高等学堂23所，学生3900余人，高等专科学校（农、工、商）13所，学生1600余人，特种学校（法、文、理、医、工艺）84所，学生15800余人。1917年，全国高等学校增加到84所，学生19800余人。其中，大学8所，学生3500余人，专门学校65所，学生13500余人，高等师范学校7所，学生1900余人，其他学校4所，学生500余人。特别是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迅速增多，1916年，官费留学生有1万多人，1917年，各省省费留学生就有1396人，此外，还有一部分自费生。知识分子队伍，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民族危机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投入拯救国家危亡的斗争之中。

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使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反帝反封建力量的增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是反专制主义斗争的主体。大战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反专制主义势力。两种势力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使反专制主义的斗争出现了强化的趋势。二是反专制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反专制主义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展开的，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反专制主义，改造社会的要求，又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手段。这样，就使反专制主义斗争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两军对垒，而是表现得十分错综复杂。三是各种阶级矛盾和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特别敏感和尖锐。由于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特别是知识分子政治觉悟、爱国热情的增强，各种阶级矛盾和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特别敏感和尖锐。四是反专制主义队伍内部开始出现分化。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展开，反专制主义队伍中的知识界也逐渐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第二节 五四运动

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特别是民主与专制的激烈矛盾斗争，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易白沙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烈火。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反对专制政治与迷信盲从，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痛切地指出，中国陈朽腐败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落后于欧洲几及千载，如“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而退归天然淘汰”^①。陈独秀认为，民主和科学，是“近代欧洲之时代精神”，“近代欧洲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国人欲“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陈独秀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③。陈独秀认为，对于现实社会中那些虚妄、迷信、盲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③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四川的吴虞对封建的宗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从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封建的专制制度以及家族制度的关系上，对儒家学说进行批驳。吴虞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儒家的孝悌二字”又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要摧毁封建君主制，必须先摧毁它的基础——封建家族制。

第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开展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革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言；（三）不用对仗；（四）不避俗语俗字；（五）讲究文法结构；（六）不做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言之有物。胡适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要有“高远的理想”和“真挚的感情”；反对文学“违进化之迹”，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写今日社会之情况”；反对“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主张文学要“奋发有为，服劳报国”；反对“精力用于微细纤巧之末”，主张废骈、废典、废律；反对“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随后，他相继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进一步阐明了文学随时代变迁，是“文明进化之公理”，推翻古文的正统地位，“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是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胡适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写了许多白话文和白话诗，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开展。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并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中国现实的文学，不过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

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①所以，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翻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无情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反民主反科学的黑暗状况，将吃人的礼教淋漓尽致地展示给读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的本质，击中了封建文化思想的要害，引导和召唤人们，为踏上民主和科学的道路而斗争。

1917年1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亦前往任教。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复古主义者和军阀政府的极大恐惧。封建卫道士、复古主义者竭力攻击新文化运动。1918年夏，辜鸿铭写《春秋大义》，宣扬儒家学说是“示人以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公开对抗新文化运动。“文选派”刘师培等，于1919年初，创办《国故》月刊，攻击新文化运动“使功利倡，而廉耻丧，而礼仪亡”。1919年2月，桐城派文人林琴南（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丑化新文化运动；在复古主义者们为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八股文进行辩护的同时，北京军

阔政府下令查禁邮件和进步书刊，以“过激派”为名迫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指使国会议员弹劾教育部，胁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离职。

面对复古主义者的进攻，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1919年1月，《新青年》发表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破坏孔教，破坏礼法……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要拥护那德先生（指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指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在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李大钊表现了坚定的斗争精神。1919年3月，他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援引俄罗斯的历史，痛斥封建主义以强暴摧残进步，坚信“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封建主义文化的壮举。它猛烈地抨击了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地传播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热潮。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

新文化运动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之中，没能完全摆脱自发性，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没能把广大工农群众动员起来，没能从经济关系上剖析旧思潮、旧文化的根源。因此，不可能触动整个封建剥削制度，仍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

新文化运动还有很大的弱点，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分析历史与现状时所用的仍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在主张科学与民主

的同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一切都是糟粕，加以排斥；认为外国的一切学说都是好的，给予肯定。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否认新旧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关系，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也必然影响对旧文化批判的科学性及要达到的目的。

二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的大字标题，报道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即列宁）”的消息。《时报》、《申报》、《晨钟报》、《太平洋》杂志以及长沙《大公报》等均作了类似的报道。1918年3月，《劳动》第一号发表《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列宁事略》一文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和平外交、国内政策逐步有所了解。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深远的划时代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从而使中国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革命斗争，虽然就其任务而言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十月革